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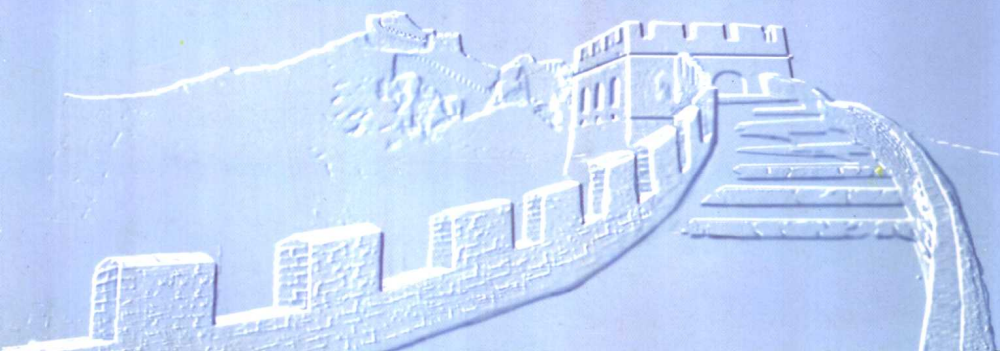


共和国将帅之路

将之

帅

一样的瑶瑟和鸣
一样的风煎雨煮
一样的地远天遥
一样的深情重



·共和国将帅之路丛书·

将 之 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之情/多人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6
（共和国将帅之路丛书）

ISBN 7-5033-0881-8

I. 将… II. 多…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57千字 定价：17.00元（膜）

目 录

M U L U
M U L U



刘司令的命令,邓政委的决心	(1)
彭德怀、黄克诚“言不及私”	(9)
陈赓、彭德怀一庄一谐两情长	(25)
胡耀邦与杨勇的诀别	(35)
陈毅三次婚恋一往情深	(39)
聂荣臻夫妇的悲欢离合	(59)
陈赓的传奇姻缘	(78)
罗瑞卿郝治平八载磨炼更同心	(88)
许光达邹靖华患难夫妻真情在	(109)
戎马情侣——王震与王季青	(140)
杨勇战火中的婚礼	(175)
夫妻将军——甘泗淇与李贞	(180)
孙胡子的恋情与亲情	(210)

独臂将军与他的夫人·····	(220)
莫文骅心中的故事永不老·····	(251)
流年似水情愈深·····	(266)
周希汉将军和他的作家女儿·····	(279)
谭冠三情满雪域·····	(307)
甘渭汉心系井冈·····	(325)
“潇洒伉俪”——王宗槐与范景明·····	(339)
顿星云和三个女性·····	(354)
越籍将军的中国之恋·····	(380)
陈茂辉与蒋军败将·····	(408)
如果来世再选择·····	(422)
铁马冰河入梦来·····	(436)
弥留之际的嘱托·····	(448)
编后记·····	(453)



刘司令的命令， 邓政委的决心

邓小平和刘伯承，早在1931年江西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了，但他们俩人一起合作共事，是从1938年1月邓小平到一二九师任政委时开始的。从此，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位四川同乡，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并肩战斗，一直到1951年刘伯承从西南调离回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邓小平常说：“刘司令员年老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在长达13年之久的共同军事生涯中，刘邓二人，互相支持，紧密配合，通力合作，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情。

按照分工，刘伯承是主管军事工作的，邓小平是主管政治工作的。但是，他们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分工不分家，始终在工作上互相支持，默契配合。邓小平常说：“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就该既分工又合作。”每逢作战前夕，邓小平和刘伯承都是在作战地图前运筹作战方案和计划，亲切地切磋战术。刘伯承认真地听取邓小平的见解，邓小平则不断地点头赞同刘伯承的真知灼见，他们并肩思谋，共同酝酿即将到来的激战的具体

部署。每逢布置任务或是下达命令时，刘、邓的讲话总是一个没有讲完，第二个人接着讲，使你后来很难记得哪一段是邓小平讲的，哪一段是刘伯承讲的。可是，听讲后的人的脑中却有一清清楚楚的概念：这就是刘、邓的意图。每当收到中央指示的文电或是下面部队的战斗报告，邓小平和刘伯承都会一起来到作战室，对照地图，认真阅读，反复研究，及时作出贯彻执行和下达指示的要求。每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在最后定下决心和意图前，刘伯承都要请邓小平发表意见，邓小平总是最先敏锐地分析判断敌情，提出几种打的方案，并明确提出自己的肯定意见。在一般情况下，刘都是同意邓的意见，并根据自己的丰富经验加以具体充实和完善。事实上，在整个刘邓大军的战斗史册上，许多重大作战方案，是刘邓一起商定的，各种命令是以刘邓署名签发的，多次重大战役是刘邓共同指挥的。正如当年在二野部队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刘司令的命令，邓政委的决心”，这正是邓小平、刘伯承互相支持、默契配合的真实反映。

邓小平、刘伯承在长期共事中，之所以能够亲密合作，互相支持，在于他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具有坦荡宽广的胸襟。即使有时因来不及商量，其中的一位对另一位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对对方分管的工作作出了决策，另一位也是热心支持，并坚决贯彻执行。

1946年夏天，我军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主动向陇海路出击。刘伯承乘一辆马车在进军濮阳的途中，向当时陪同他行进的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问道：“你看把总部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需要几部大车？”民运部长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回答：“我看五部就足够了。”

但到了濮阳城以后，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大车，刘伯承在驻地看到后，质问民运部长：“你说只要五部，现在为什么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

刘伯承在地上踱了踱步，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下令召集来开会的军区和各纵队干部训话。

按理说，像军民、军政关系这类政治工作，是邓小平政委分管的，刘伯承事先没有跟邓小平政委通气，就把这么多干部找来训话。按职责上超出了范围。但邓小平认为，刘伯承抓的是涉及军民、军政团结的大事，部队在这方面做了错事，军事干部出面批评也是应当的，因此，他主动跟大家站在一起，认真听取刘伯承的严肃批评。

刘伯承讲完后说：“请邓政委给大家讲话。”

邓小平马上走上前，转向大家说：“师长（邓小平曾经再三解释，他称呼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听惯的人是懂得的，其实刘伯承是司令员）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几句简短的话语，寄予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真挚的情感和尊敬以及工作上的支持。

同样地，刘伯承对邓小平在军事方面工作提出的意见，也十分的尊重，他不仅经常在军事工作问题上请邓小平发表意见，而且在许多重大战斗战役的命令颁布、决定、布置等军事工作问题上，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

1947年8月26日晨，刘邓大军在挺进大别山强渡汝河后，受阻于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此时追敌已迫近，又值雨季，河深水急，不能徒涉，而部队仅找到十多只小木船，形势变得十分险恶。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果断地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组织指挥渡河，刘伯承、张际春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对此，刘伯承听罢毫不犹豫地对大家吩咐道：“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1948年12月中原野战军把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后，围绕着采用什么战法来合围这个问题，在中原野战军的决策机关里有两种意见：邓小平和张际春主张把敌人

包围死，用阵地战消灭敌人；而司令部的一些参谋则倾向于采用刘邓惯用的“围三阙一”的战法，刘伯承开始也曾考虑过用此战法歼灭敌人。但是，经过深入研究，刘伯承最后说：“邓政委和张副政委的意见是对的！”最后，刘伯承根据邓、张的意见，果断地命令中原野战军部队猛力合围，并死死圈住敌人。

正是由于刘邓的团结协作，默契配合，从而使他们俩能数十年如一日指挥刘邓大军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能百战百胜，从胜利走向胜利。邓小平年富力强、思维敏捷、胆略过人；而刘伯承是著名的军事家，经验丰富、沉着稳健。他们俩人的智慧和才能熔铸为一体，每研究决定一个问题，总是那么正确、迅速、稳妥、可靠。“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刘邓部队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总是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坚决完成任务，从不讲价钱、叫困难。

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战斗友谊，来源于他们俩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互相体贴；在工作和任务面前，又总是争挑重担，多做工作，分担对方的担子。

据当年在刘邓部队工作过的同志回忆：邓小平总是把刘伯承当兄长那样尊敬爱护，刘司令员同样尊敬关怀邓政委，他们俩人始终都彼此关心和牵挂对方安危。“每当邓政委出征时，不论是酷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冬天，刘司令员总是步行送上一程又一程，再三叮嘱邓政委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时刻照顾好邓政委的生活与安全；分手后，直到目送邓政委身影消失了才转身返回。有一次，部队要过黄泛区，天上有敌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政委就搀着刘司令员，顺利地涉过了几十里路的‘水乡泽园’”。

在战争危险的时刻，刘伯承总是牵挂着邓小平的生命安全，有

时甚至于寝食不安。1942年3月中旬，日军春季“扫荡”之后，为了尽快扭转不利局面，准备对付更大的困难，组织上决定刘伯承师长留在太行区指挥“反扫荡”作战，邓小平政委率772团一部去太岳区布置检查工作，总结经验。邓小平去太岳，要通过敌人封锁的白晋线，相当危险。对此，刘伯承为了邓小平的安全，不仅事先亲自做了严密部署，并于邓小平通过白晋线的3月19日晚上，通宵未眠，亲自坐在师作战科值班室等待电话。当时同志们多次劝他休息，他都不肯。直到天快亮了，陈赓来了电话，告知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他才放心地回去睡觉。在邓小平到太岳区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形势日益紧张。5月1日，日军便开始了对冀中的大规模“扫荡”，并扬言不日即开始“扫荡”太岳区。对此，刘伯承师长又吩咐李达参谋长说：敌人的扫荡，在最近几天就会全面展开，目标首先是太岳区，而邓政委正在那里，你要告诉沿途部队，要确保邓政委的安全。

同样，作为相对年轻的邓小平，始终一贯关心爱护刘伯承，他经常争挑重担，多做工作，除了做好政治工作外，还主动参与军事决策，协助刘伯承共同指挥战斗战役，有时也单独指挥作战，以便分担刘伯承肩上的担子，照顾年老体弱的刘伯承，尽可能地让刘伯承多休息，多保重。

邓小平每逢在战役战斗命令下达后至战役发起前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总是主动照顾刘伯承，劝他抓紧时间休息，而自己却一刻不离地守在电话机旁，进行不间断的指挥。下边报上来的问题，不论巨细，都能及时解决。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不让繁重的具体事务干扰刘伯承的休息。

1947年12月，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同时决定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求彻底打破敌人的阵势。为此，刘、邓决心采取“避战”方针，成立两个指挥部。考虑到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形势相当严

峻，气候环境相当险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而刘伯承年老体弱的情况，邓小平自告奋勇地提出留在大别山再坚持斗争，他对刘伯承说：“我比你年轻 12 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还是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最后，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三人，带领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了大别山，坚持了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在淮海战役与黄维兵团的作战过程中，为了照顾年长的刘伯承、陈毅，作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主动提出：“两位司令员，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些。”

邓向作战科宣布：一般事情多找邓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告刘、陈、邓三位首长。为此，邓小平担负了战役的全部具体指挥工作。邓小平总是天天守在作战室里，坚持每天值班到深夜，甚至到下半夜，一直等到各纵队战斗情况基本上无大变化时，他才离开作战室。对于刘、陈、邓每天共同商定的各纵队的作战任务，也多是由邓政委在电话上向各纵队首长亲自传达和部署的。对于各纵队的战斗进展情况，邓政委除随时听取作战值班员汇报外，几乎天天亲自找各纵队领导同志通电话，一方面督促检查他们对作战计划、命令的执行，一方面直接了解战斗进展情况，掌握战场上的第一手材料。晚上，为了在住宿的地方接电话而又不影响刘伯承休息，他常常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

邓小平生于 1904 年，刘伯承生于 1892 年，从年龄相差不少；从性格爱好上说，二人各异而无相同。他们在长达 13 年之久的共同军事生涯中，虽然有时也有争论和意见分歧，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工作和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他们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那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长期在一起工作，在一

起生活，使他们俩人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彼此难以分开”的思想情感。

杨国宇曾在《刘伯承用兵要旨》一书的编后中这样写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十几年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刘邓曾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 129 师和第二野战军，共同经略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亲密无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邓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而在一个战役接连一个战役，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这种漫长而又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在这种极度耗费脑力和体力的战场生活中，刘邓又是互相把挑在对方肩头上的重担换到自己肩头上来，分成两副担子来分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邓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以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刘伯承、邓小平曾在太行山和大别山两次分开指挥部队作战，但是，在他们的电报、作战指示、命令等中，仍始终签署“刘邓”二字，使人无法体察到他们的分开。在人们的心目中，“刘邓不可分”、“刘邓连在一起”、刘邓“彼此难以分开”，把他们俩称为刘邓首长，把他们率领的部队呼之为“刘邓大军”，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这些，正是邓小平、刘伯承两位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亲密无间、彼此难分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自己曾多次谈到他和刘伯承彼此结下深厚情意的情况。早在 1942 年刘伯承诞辰 50 周年时，邓小平怀着对刘伯承的崇敬，发表了热情洋溢、感情深厚的长篇祝词《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他说：“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 1931 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

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他又深情地说：“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祝福他健康，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

1986年，刘伯承不幸病逝，邓小平怀着失去亲密战友的沉痛心情，带领全家参加了刘伯承的追悼会，并发表了感人的《悼伯承》一文。他在文中充分表达了他的怀念之情，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逝世，使我至为悲痛。”邓小平在追述了刘伯承的革命生涯后说：“我认识伯承，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129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莫鸿杰）



彭德怀、黄克诚“言不及私”

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人之间友情之深，从下面几段话里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写检讨的过程中，曾经慨叹说：“免掉我这个国防部长，我是很愿意的。原先总以为还有黄克诚可以当，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这一套不会中断。现在看来，黄克诚也当不成了，要是把很多工作都中断下来，那就太可惜了。”

黄克诚在庐山冤案平反以后说：“当时毛主席临时通知我上庐山参加会议，是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凑班子的。既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你们想想，彭德怀搞‘反党集团’，要是没有黄克诚参加，谁会相信？！”

还有，周恩来在庐山会议期间曾经深表惋惜地对黄克诚说：“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号以前上庐山，彭老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

—

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人们都知道彭、黄的关系比较好，但是真正了解得很清楚的人不多，连毛泽东也不很了解他们的关系。

1959年7月30日上午，中共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前夕，

为了准备对彭德怀进行更严厉的揭发批判，毛泽东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个人叫到“美庐”别墅谈话。谈话的主要意思，是暗示他们不要跟着彭德怀走得太远，应当及早同彭德怀划清界线。

毛泽东在谈话一开头，就特别对着黄克诚说，过去不很了解你的历史，也不很了解你和彭德怀的关系。接着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在小组会议上，为什么很多人说你对彭德怀是唯命是听，惯言你们是“父子关系”？

还有些人说彭德怀对你言听计从，说你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这又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人们还说你们是“湖南小集团”？

毛泽东最后还加上了一个说法，那就是所谓“军事俱乐部”。

对于以上这些说法，黄克诚在恢复工作以后回忆说，“这是当时给我扣的四顶帽子。”这些政治“帽子”，并没有把黄克诚吓倒，而是使他非常恼火。虽然当时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已经被批判为反党、反毛泽东和反“三面红旗”的头子，但是黄克诚并不怕别人谈论自己同彭德怀的亲密关系。只是人们用这种诬蔑性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关系，而且现在通过毛泽东之口又向他提出来，实在使他难以容忍。

于是黄克诚这个一贯崇敬毛泽东的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在毛泽东每提出一个疑问之后，黄克诚便立即插上来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

在毛泽东提到所谓“父子关系”时，黄克诚说：“这是侮辱人。我和彭德怀都是共产党员，是同志关系。我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对他有服从的一面，也有争论的一面，而且我同他争论的次数比别的人都多。不论我们争论得多么激烈，但是过后照样工作，谁也不去计较。我们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当毛泽东提出有人说黄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时，黄克诚更加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个总参谋长是主席你提的名，在你给我谈话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是这个材料，言谈举止都没有个军人姿态，怎就能当总参谋长！可你仍然非要我当不可，我算是什么‘政治参谋长’！”

接下去黄克诚还辩驳说：“在你开始批评彭德怀同志那天晚上，我和周小舟他们几个人只是在一起谈了一次彼此的心情，怎么能说成‘湖南小集团’。要是照这样推论下去，党内小集团就太多了，往后同志间谁也不要同谁交往了。”

关于“军事俱乐部”，黄克诚说，当时他觉得毛泽东提得比较笼统，所以没有多加辩解。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黄克诚那种措辞激烈的辩驳，没有计较。反用缓和的语气说，这些疙瘩要解开。随后又谈了长征中的旧事，谈了在遵义会议之前，他怎么先把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否则遵义会议也难开好。

毛泽东还提到解放战争期间，黄克诚不赞成举行“保卫四平”战役，曾向林彪提出意见，林彪未加采纳的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决定的，不关林彪的事。”黄克诚便说，“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

看来，黄克诚对于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深刻用意，似乎没有理解，也许是意识到了一些，不愿做出违心的反映。所以“这些疙瘩”就只有拿到三天之后的八中全会去“解开”了。

二

三天过后，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黄克诚分在第五组，是全组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揭发批判的中心问题，不是黄克诚犯有什么路线错误，而是他和彭德怀的亲密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背景。

这正像黄克诚后来讲的，“在庐山会议上我有什么大错误，有什么好批判的！自然只有抓住我和彭老总的关系这个问题，才能把我和彭老总的‘错误’扯到一起。”

在小组会上，有的人分析彭、黄的关系说，黄克诚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想把他们两人之间的友情庸俗化为私人勾结，互相利用，哥们儿义气。这种分析虽然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但事实证明却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彭德怀救过黄克诚的命，确有其事。对于这件事，彭德怀在1962年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的“八万言书”中郑重其事地讲过。后来黄克诚在回忆录中也详细叙述过。现在我们谈到他们两人讲述的情节，不仅可以证实所谓“报答救命之恩”的说法是对他们的污蔑之词，而且还会感到他们保护革命同志的勇敢行为异常值得钦敬。

彭德怀在1962年6月，为了要求党中央进一步审查他的问题，给他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曾经写了“八万言书”，其中有一节就是“我与黄克诚同志的关系”。他首先声明说，由于在庐山八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反党集团”内有黄克诚同志，所以他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彭德怀写道：“1931年冬，我赴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袁国平同志（当时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黄克诚同志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说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陈独秀（取消）派，并且准备处死。我返抵军团司令部后，我（当时是前委书记）坚决反对这一种作法。我认为机会主义不能当成反革命一样处理。经过讨论，决定又恢复了黄克诚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这件事，我从来未对任何同志讲过，也未对黄本人提起过。直到庐山会议时，在主席处黄说我对他有救命之恩，我才知道黄已经知道了那件事。”

时过几十年之后，黄克诚在回忆录里，也专门写了一节，是